

何炳棣 著

# 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

1368—1953

海外史

中华书局

何炳棣 著

# 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

1368—1953



中华书局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 1368—1953/何炳棣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7

(何炳棣著作集)

ISBN 978-7-101-09413-8

I. 明… II. 何… III. 人口-历史-研究-中国-1368~1953  
IV. C92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17753 号

- 
- 书 名 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 1368—1953  
著 者 何炳棣  
丛 书 名 何炳棣著作集  
责任编辑 李 静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640×960 毫米 1/16  
印张 27¼ 插页 2 字数 300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9413-8  
定 价 109.00 元
-

## 出版说明

何炳棣先生，著名历史学家。1917年4月6日出生于天津。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1944年考取第六届清华中美庚款留美公费生，1945年赴美。1946至1948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主修英国及西欧史博士课程，通过口试，1952年获得博士学位。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曾先后任教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1948—1963年）、美国芝加哥大学（1963—1987年）、美国鄂宛加州大学（1987—1990年）。1966年当选台湾“中研院”院士。1975至1976年任美国亚洲学会会长。1979年获选为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士。1997年获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高级研究员。2012年6月7日，在美国加州家中去世。

何炳棣先生自幼在“亲老家衰”的自我压力下，发奋读书，力争上游。博士毕业后，即致力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其关于明清人口及明清社会阶层间流动的研究专著，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60年代末，何先生的研究兴趣转入中国农业的起源，并进而把研究对象扩展到中国文化的起源上。《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东方的摇篮》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80年代末、90年代初，何先生在深思熟虑后，决然投入先秦思想史领域，选择“攻坚”，

研究中国思想史中最关键的基本课题，完成了一系列重要论文。

何炳棣先生一生治学，从不做“第二等”的题目，向来“扎硬寨，打死仗”，视野宏阔，博征史料，而著述则精要严谨，下笔必有建树，且数十年坚韧不拔，孜孜不倦，故成就卓著，贡献杰出。

何炳棣先生与中华书局交往密切，晚年拟将毕生著述加以修订，交付中华书局，以“何炳棣著作集”之名，系列出版。其主要学术著作，多用英文写作与首次发表，其中部分已被译为中文，皆应收入“著作集”中；未译为中文的，待译成后再行收入。而晚年有关思想史方面的系列论文，为何先生一生学术的“画龙点睛”之作，则均以中文写成，编为《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收入“著作集”中。遗憾的是，天不假年，何炳棣先生未能完成全部修订工作，更未能亲见“何炳棣著作集”的出版。好在，学术可以长存。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15年2月

## 序

研究最近几个世纪的中国史最大的资料来源之一是方志，美国藏有三千多种，另有三百多种早期稀见方志的缩微胶片，合计大约四千种。对中华帝国的全部主要行政区，从县以至省，方志都提供了极其广泛而具体的资料，如地理志、经济志，包括大量文献的史事记述，无数人物传的汇编，有关风俗、宗教和其他制度的文章等等。这些方志同卷帙浩繁的官修类书及其他各主要行政方面的会要，使现代社会历史学家面临着艰巨的挑战——如何从这些汗牛充栋的现代前的资料中筛选出与现代意义的课题有关的必不可少的记载来。

对中国以往几个世纪的这一任务所面临的困难与西方中世纪史学家所遇到的不相上下。首先，方志涉及的制度已成过去，所有的术语往往与其字面含义不符，极易被忽视或误解；而且，这些典籍，即便是现代人以前编成的，代表了以往缺乏定量化的时代。它们的“统计数”并不是现代头脑的政府统计人员或经济学家的统计数，只不过是文人学士或墨守陈规的书吏记下的一些数字，充其量只能说明数量大小的次序或满足记载中的数字资料形式上的需要。现代研究者会发现，表格所列有时与总数不符；人

们还会发现，官员们所接受的定额或总数并不是该阶段测定的新的结果，而是从以前的材料中照抄下来的。在这种传统下，统计数字所能反映的当时实况，与它们所反映的史官们所恪守的陈陈相因的书面记载不相上下。有些编纂者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头扎在故纸堆中。因而，这种挑战的部分意义就是如何找到那些为数不多的具有探求思想、以新的和怀疑的眼光看他的国家的观察家的纪录。

所以研究这些资料的当代学者必须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敏锐与深入的典章制度知识结合起来；同时还应如当代史学家那样具有啃完吨文件的耐久力，因为光现有的清代史料就有成千上万卷，页数以百万计。

何炳棣博士就是以充实的学识和始终不渝的勤奋对待这一任务的。例如他对中国方志中关于作物传播的研究就发现了新的证据，足以使这段历史重写。他致力于钩稽有关人口和各种相关因素的资料，以此为基础写成的这本著作对这一专题此后的研究者作出了贡献。尽管本书是有关人口的，何博士却毫不含糊地回避了定量分析，因为中国的明清时代并不具备为这一目的需要的人口普查数据和政府统计报告这类现代或接近现代的统计数。正如何博士在《前言》中所指出的，他对制度方面的结构和有关术语重新作了考证，而这些对史料的运用都是极为重要的。这使他对像“丁”和“亩”这类常常被毫无分析地接受的关键术语重新确定了含义，并重新研究了不同时期官方人口估计数的汇编过程。

对当世学人试图对诸如出生和死亡、迁移、粮食产量、营养不良、杀婴，及其他许多对中国过去六个世纪的人口有影响的因

素作数量分析方面，中国的史料不能作为可靠依据，何博士将成为声明这一个人的最后一人。反之，他从现有史料中发掘出的资料可能对社会历史学家产生启示，并为研究中国人口的学者保留充满希望的兴趣，或许也是令人沮丧的影响。

费正清 ( John K. Fairbank )

1958 年 4 月



## 前 言

今天，到处都承认中国的人口不仅是一个国内问题，而且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因而对中国人口增长的事实与过程的兴趣已不限于人口统计学家和远东问题的专家。

在中国人口的发展史上，没有哪一段的重要性比从 1650 年（清顺治七年）至 1850 年（道光三十年）这两个世纪更大了。在异常有利的物质条件和清初统治者的“开明专制”治理下，人口激增，到 1850 年可能已达 4 亿 3,000 万。结果是到 18 世纪末，中国的资源已变得极其窘迫，以至经济陷入了当代学者所熟知的困境。

尽管中国和西方学者对中国人口问题已有多种研究，但很多方面依然模糊不清。正如亚历山大·卡尔桑德斯（Alexander Carr-Saundess）所指出的：困难并不在于缺乏人口数据，而在于如何理解这些数据。从 1952 年以来，我主要致力于通过追溯若干人口术语与制度内涵的演变来理解已有的清初数据，这使我上溯到 1368 年（明洪武元年）。在对卷帙浩繁的中国方志作抽样研究的过程中，我又进一步对各种必然影响人口发展的多种因素作了研究。在 1954 年 9 月，这一研究的初稿即有关 1368—1850

年期间的研究被列入哈佛—燕京专刊出版计划。在哈佛中国经济和政治研究计划的资助和鼓励下，现已将此项研究扩展到 1953 年人口普查阶段。

本书的目的在于使读者理解不同类型的人口数据的性质，并试图对在近代早期和近代中国人口为什么能够增长提出初步的历史解释。因而本书基本上仍是一篇制度和经济史论文，而并不企望它是人口统计分析。这方面的人口学技术性的论文自应由人口专家来撰写。

在准备这项研究的过程中，我多年来得益于与许多师友的研讨和协作。哥伦比亚大学的何廉教授和韦慕廷（C.Martin Wilbur）教授对早期的研究提出了建设性的批评；我与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哈里·B. 霍索恩教授经常相互切磋，詹姆斯·O. 圣克莱索贝尔在关于中国 1953 年人口普查的重要俄文资料方面给予帮助，尼尔·哈罗先生保证了一些必须的研究资料；哥伦比亚大学远东图书馆的霍华德·林顿先生和理查德·霍华德先生、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的裘开明博士及其馆员、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吴光清博士和王恩保先生都给予可贵的帮助；谨在此向他们致谢，我尤其应感谢裘博士在五年多时间里提供的大量馆际借阅。

哈佛大学杨联陞教授和前在哥伦比亚大学、现在哈佛大学研撰的瞿同祖先生经常为我查考有时甚至抄录不少这项研究所必不可少的资料。杨先生以其渊博的中国经济史知识来满足我的要求。昔日同窗王德昭教授适自东方来哈佛作访问学者，帮我查阅了数百种 19、20 世纪的方志，使我对 1850 年后的资料也能像对

此时期前的资料一样，作广泛的查考，这对第七章地区间的移民贡献尤大，由于这方面的资料极其零散，至今还鲜为人知。对这些旧友的感激之情我将永志不忘。

我感谢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清华教学与研究基金会和哈佛大学中国经济和政治研究计划的连续资助，使我有五个夏天能在美国东部从事研究。

但我最应感谢的是贤妻邵景洛，没有她的自我牺牲，这项研究是决不可能进行的。

何炳棣 (P. T. Ho)

1957年8月于温哥华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 目 录

序/1

前言/1

## 上卷 官方人口记录

第1章 明代人口数据的实质/3

第2章 丁的实质/28

第3章 1741—1775年的人口数据/42

第4章 1776—1850年的人口数据/56

第5章 1851—1953年的人口数据/78

## 下卷 影响人口的诸因素

第6章 人口—土地关系：明清和现代土地数据/119

第7章 人口—土地关系：超省际的人口迁移/162

第8章 土地利用与粮食生产/201

第9章 其他经济和行政因素/231

第 10 章 天灾人祸的后果 / 268

第 11 章 结 论 / 304

## 附 录

附录一 乾隆六年—道光三十年 (1741—1850) 官方人口数 / 331

附录二 乾隆五十二年 (1787)—1953 年人口地理分布的变化 / 334

附录三 同治六年 (1867) —1937 年中国主要的粮食进口 / 341

附录四 顺治元年 (1644) —宣统三年 (1911) 湖北的天灾 (受灾县  
数) / 345

附录五 宋金时中国人口总数的估计 / 358

引用书籍、论文目录 / 379

译后记 / 407

译者再记 / 410

何炳棣教授履历及主要著作目录 / 412

表  
格  
目  
录

- 表 1 绩溪县人口 / 8
- 表 2 洪武十四年—十五年 (1381—1382) 永州人口 (73,005 户) / 9
- 表 3 洪武二十六年 (1393) 中国人口 / 11
- 表 4 明代上海县人口 / 14
- 表 5 常熟县人口统计数 / 20
- 表 6 嘉靖元年—三十一年 (1522—1552) 宁波府人口 / 21
- 表 7 吴江县人口统计数 / 21
- 表 8 连江县人口统计数 / 23
- 表 9 以地、以丁定差的百分比 / 34
- 表 10 萧山县人口 / 48
- 表 11 乾隆二十一年 (1756) 襄阳府人口统计数 / 50
- 表 12 洛川县人口统计数 / 52
- 表 13 嘉庆二十五年 (1820) 十四省户口数 / 66
- 表 14 乾隆四十一年—道光三十年 (1776—1850) 中国人口的性比率和儿童所占百分比 / 68
- 表 15 同治十一年 (1872) 浙江二县人口统计数 / 82

- 表 16 安徽 44 县警察总、分所数（至 1911 年）/ 90
- 表 17 安徽有代表性十县 1931 年及 1933 年保甲统计数 / 100
- 表 18 1937—1941 年湖南保甲数 / 102
- 表 19 官方全国人口数 / 103
- 表 20 1947 年和 1953 年分省官方人口数 / 111
- 表 21 洪武三十一年（1398）—1932 年中国官方土地数 / 119
- 表 22 温县折亩率、税率 / 125
- 表 23 江山县折亩率 / 131
- 表 24 松江府折亩率 / 132
- 表 25 宜兴县折亩率 / 132
- 表 26 安徽省折亩率例表 / 135
- 表 27 徽州地区折亩率 / 135
- 表 28 福建折亩率 / 136
- 表 29 嘉靖十七年（1538）武进县土地统计 / 146
- 表 30 洪武二十六年（1393）—1932 年各省官方土地统计数 / 148
- 表 31 卜凯估计与土地陈报数据的比较 / 152
- 表 32 卜凯估计与江西 12 县航测数据的比较 / 156
- 表 33 卜凯估计与湖北 6 县航测数据的比较 / 157
- 表 34 光绪二十四年（1898）余杭县外来移民的原籍 / 186
- 表 35 1923—1929 年满洲移入、移出及居留人口数 / 192
- 表 36 嘉庆元年—宣统三年（1796—1911）汉水洪水频率 / 271
- 表 37 1931 年长江大水造成的损失 / 276
- 表 38 1938—1948 年黄河泛滥造成的损失 / 277
- 表 39 道光三十年—光绪六年（1850—1880）广德县人口变化 / 283
- 表 40 太平天国战争期间的人口损失 / 284
- 表 41 江苏、浙江、安徽、江西道光三十年（1850）与 1953 年人口数 / 292

表 42 1937—1943 年国民党军队的伤亡数 / 297

表 43 1937—1943 年平民的生命损失数 / 298

表 44 人口地理分布的变化 / 306



上卷  
官方人口记录